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200083854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208 号

责任编辑：胡乃羽

封面设计：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京丽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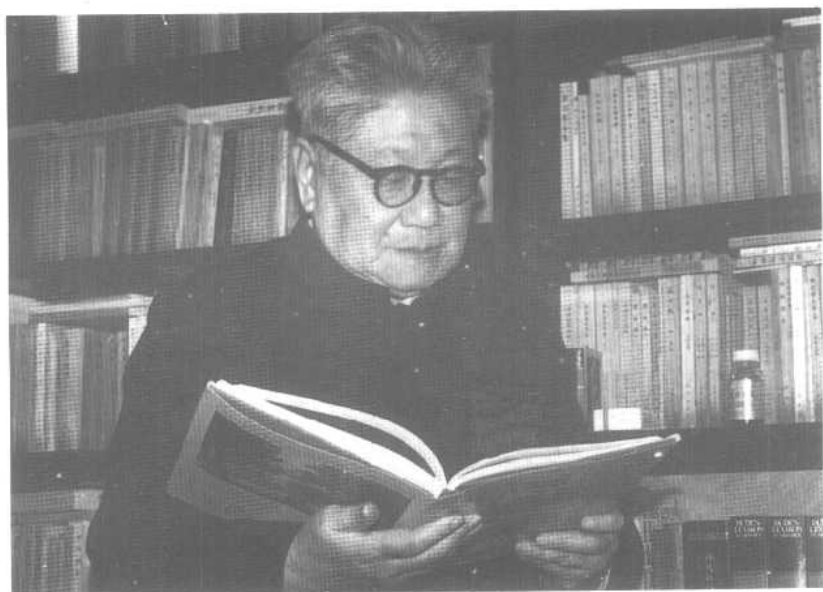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332千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1014-621-1/I·20

定价：16.00元



冯至先生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冯至学术精华录》，现受作者委托，更名为《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并作了必要的校改。此项工作难度很大，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1月

自序

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但我一生没有停止过读书，也经常写作。我读书，有如饥渴时需要饮食，却不曾像营养学家那样分析饮料和食品的成分；我写作，不过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人们说这是文学创作。可是有些书，我从中获益较深，想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并且要知道这些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有时也遇到文学上的个别问题，感到兴趣，想研究研究，表示一点意见。在这些愿望的指使下，我于文学创作之外，写了少量关于作家作品以及个别文学问题的文章，我只能把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划入学术论著的范围。前者印制成书的有《杜甫传》（1952年出版，1980年重版）和《论歌德》（1986年，其中有一部分包括1948年出版的《歌德论述》），后者则散见于《诗与遗产》（1963年）和《冯至选集》下卷（1985年），另外有少数篇章没有收辑成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我编选一部学术论文集，我最初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文章不多，绝大部分都收辑成书了，我一向认为一稿两投、一文数见有损于原书出版者的利益，而未收辑成集的文章又寥寥无几。随后一转想，近几年来书的市场上形势变了，不合时宜、不能畅销的书很难得到再版的机会，并且印数越来越少，往往书的出版之日，就是书的绝版之时。我常听说，有的读者想买一本迫切需要的新书，到书店去问，回答说是“没有”，到出版社去找，则是业已脱销。我从我的印数不多、脱销也不能再版的书中选出27篇文章，加上12篇未收辑成集的，编辑成另一本集子出版，以满足个别同行读者一部分的愿望，我想，出版过我的书的出版社也是可以谅解的吧。

这39篇文章始于30年代中期，止于80年代的今日，没有按照时序、只按照文章内容编排，但每篇都注明写成的年代。经过半个世纪，自己的思想有过不少变化，前后矛盾或重复之处都难以避免。总的看来，这些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如初冬的菊花，花瓣虽不凋谢，却也不显得新鲜了。

1987年11月8日

上 卷

019908

目 录

上卷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1945年)	1
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1945年)	6
从“长安十载”到“夔府孤城” (1952年)	11
《杜甫诗选》前言 (1952年)	117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1962年)	130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1962年)	145
日文版《诗人杜甫》序 (1985年)	165
谈《儒林外史》 (1954年)	170
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 (1940年)	185
中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1959年)	190
从《古文观止》谈中国散文的特点 (1981年)	201
论历史的教训 (1944年)	205
批评与论战 (1947年)	210
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 (1984年)	218
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学术语 (1983年)	223
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 (1981年)	233
《花城袖珍诗丛》总序 (1984年)	237

欣慰与“困惑”(1986年)	239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1982年)	242
——《李广田文集》序	
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 (1947年)	261

下卷

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1982年)	269
歌德的晚年(1941年)	282
——读《爱欲三部曲》后记	
《浮士德》里的魔(1943年)	292
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 (1944年)	314
《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1979年)	329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文译本序言 (1943年)	357
“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1985年)	375
——《论歌德》代序	
歌德与杜甫(1980年)	399
歌德学术讨论会开幕词(1983年)	415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本序(1984年)	420
《海涅诗选》译者前言(1956年)	428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译者前言 (1977年)	443
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1年)	460
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1945年)	468

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点意见(1958年)	473
里尔克(1936年)	481
——为10周年祭日作	
工作而等待(1943年)	486
《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序(1985年)	493
纪念《译文》创刊50周年笔谈(1985年)	501
自传	507
主要著译目录	511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175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中国经过许多变化，我们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过的世界了，但是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有关于杜甫的讲演，使人感到，拨开那些诗话与笔记之类在他周围散布的云雾，而露出他的本来面貌与真精神的时日好像快要到了。

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以近30年而论，在民国10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解放，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以及两性的关系上都不易寻得出路，于是陷入感伤的或彷徨的状态，所以后主词，《漱玉词》，甚至《饮水词》和《两当轩集》都成为

当时一般青年心爱的读物。这是由于“同”。至于同时兴起的对于屈原的不断的研究与推崇，可以说是由于“异”，因为《楚辞》里那样丰富的想象，强力的表现，浓挚的深情，正是当时所缺乏的。再以介绍西洋文学而论，在为自由而战斗的高潮中，谁不会神往于拜伦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这“同”与“异”的两个因素，我们不愿意估计它们价值的高下，但如果我们给它们下一个比喻，那应由于“同”者，有若寻友，由于“异”者，有若求师。寻到了朋友，可以哀乐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师，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自己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虚心和杜甫接近，因为无论由于同，或是由于异，我们两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们早已片断地认识杜甫了；当国内频年苦于军阀的内战，非战思想最普遍时，《兵车行》一类的诗成为学校中流行的读物；在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初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则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可是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桔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

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可惜我们现在很使那些只待献香醪的人们失望！）

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同时我们却也惊心地看着，中国的文化在这1 000多年内实在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中间尽管有过两宋的理学、清初的汉学、晚明（那个黑暗时代）的所谓性灵文学，而这些与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由于这些“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但是如果我们不止于此，再望下想一想，为什么与杜甫同时而又与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话，他们不是同样经过天宝之乱吗？这样一问，杜甫就不只限于是我们的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师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他。

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钱看”时，写过这样两句：“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诚然，在当时，无知恶少都可以“谈笑觅封侯”，“乡里小儿狐白裘”更不是难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趋于“艰难”，这是他认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他在他的诗里也屡屡提到“庞德公”，对于隐逸生活不但称赞，有时还羡慕，但是他不能这样生活。他44岁时“穷年忧黎

元，叹息肠内热”，到55岁经过10多年流离的痛苦，仍然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之所以这样，正因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是他的性格。他坚持他的性格，坚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识到“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时，则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20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中国的诗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与之相比。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像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这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这些诗不仅是用眼看出来的，也不是用心神会出来的，而是用他饥饿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中国诗人中更有谁把一个时代整个的图像融汇在像杜甫在天宝之乱前后与夔州以后所写的那样的长篇巨制里的呢？只有作人执著，作诗也执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才会有如此惊人的成绩。

杜甫不但毫无躲避地承受这些“艰难”，他还专心一意地寻找“艰难”。“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掣鲸鱼于碧海，是艰难的工作，他却执著地要这样做。因此动物界里的马与鹰，自然界里的大江与落日，在他的诗里都得到适当的地位；人间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在他的诗里也得到充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并不缺乏翡翠兰苕的优美感，他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他写过“鹅儿黄似酒，对酒爱鹅儿”，但这只是他暂时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游某山庄，精神上感到一时的愉快一般，

走出来他面前仍然是艰难的现实。这类的诗，以他在长安任左拾遗与初至成都时写得最多，（这两个短期也诚然是他生命里两段暂时的休息）——就是这一部分诗也足足抵得住一个整个的王维！

杜甫由于这种执著的精神才能那样有力地写出他所经历过的山川，那样广泛地描绘出他时代的图像，使我们读了他的诗，觉得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亲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945年

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四五年来，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这个人。当然，从作品里认识作者，是最简捷的途径，用不着走什么迂途，并且除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道路。但我们望深处一问：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个秘密，有时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时使人难于寻找线索。这秘密像是自然的秘密一样，自然科学者怎样努力阐明自然，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怎样努力于揭开这个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欧洲18世纪时业已开端，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发展，如今，用分析方法的也有，用综合方法的也有，只着重诗人内心变化的也有，认为客观环境是作品先决条件的也有，材料不辨真伪不加剪裁堆积得像一部长